

场域、惯习与“后 2020”农村地区返贫及治理

——以四川省 H 县为例

赵如 杨钢 褚红英¹

【摘要】 2020 年我国已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宏伟目标，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返贫治理是“后 2020”时期农村脱贫工作的重点。以场域理论为关照，分析了“后 2020”时期产业发展对农村传统生产场域的消解和生活场域的重塑，重点考察了贫困惯习对返贫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了以产业发展改变生产场域和生活场域、构建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智志双扶铲除贫困惯习、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社会支撑体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返贫治理对策。

【关键词】 场域 惯习 “后 2020” 返贫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1)-01-0086(08)

一、引言

2020 年我国已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宏伟目标。但是，消除绝对贫困不等于消灭贫困现象，一方面，精准扶贫重塑了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贫困的韧性使 2020 年后农村地区面临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型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1]“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如何有效治理各类返贫、实现农村地区从脱贫到发展的跨越是关系到能否巩固脱贫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问题，贫困户脱贫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 2020 年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返贫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聚焦于几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现有研究主要从能力贫困理论和贫困脆弱理论展开研究。前者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认为贫困源于“可行能力”被剥夺，主要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方面探讨贫困问题。^[2]贫困脆弱性理论则从外部风险层面分析致贫原因，有学者分形研究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对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导致的返贫风险最大。^{[3][4]}二是关于返贫原因的研究。从客观原因来看，自然环境、制度安排、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健康状况等原因导致返贫。气候条件变化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对高生态敏感性和脆弱性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和极端贫困构成了极大威胁。^[5]“后 2020”时期后续政策支持缺乏是导致返贫的制度因素。虽然“精准扶贫”相关政策扶植了农村产业发展，但可能导致贫困地区间的产业恶性竞争，以至于产品滞销，形成新的返贫因素。^[6]患有大病或长期慢性病的群体返贫率较健康人群高出 1.49 倍，因为在政策帮扶下实现短时间脱贫，但受到疾病影响极容易返贫。^[7]主体素质较差是返贫的根本内生因素，具体表现为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8]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贫困群众在习得性无助和贫困文化侵袭过程中形成了基于贫困生活的个体认知，对贫困采取冷漠观望、以贫为荣、拒绝脱贫等态度。^[9]三是关于返贫治理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2020 精准扶贫目标要完成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区域从单

¹作者简介：赵如 博士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四川成都 610072

杨钢 研究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72

褚红英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3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可持续生计能力框架下民族地区返贫治理研究——以阿坝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为例”（编号：18SB0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纯农村减贫转向城乡统筹、方向从精准扶贫向全面乡村振兴。^[10]返贫治理举措主要针对返贫户能力培育和外部政策支持。从外部政策支持来看，一要在事前构建返贫预警机制，^[11]包括识别与估计贫困脆弱性和返贫风险。^[12]二要在事中转变扶贫方式，对勤劳致富者和“等、靠、要”者区别对待，制定扶持发展奖惩激励措施。^[13]构建整体性扶贫资源和信息协作系统；推动产业扶贫扎实落地；构建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联动机制。在返贫户脱贫能力培育方面，要“扶志”和“扶智”并举，增强其造血功能；鼓励家庭创业；^[14]通过教育、示范、劝导等方式祛除农村贫困文化痼，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耦合。^[15]

现有研究成果为探讨“后 2020”时期农村地区返贫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但进一步对农村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考察后发现，现有研究所参照的能力贫困论、贫困脆弱性理论等，不足以全面解释农村地区部分人口贫困惰性的成因，不能较好地回答“为什么四肢健全者在产业扶持政策下依然有返贫威胁”等问题。事实上，除去自然灾害、生病等偶然性致贫因素外，行为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是导致“后 2020”时期农村地区返贫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地区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理念、生活习惯等多维因素形塑了难以根除的贫困惯习。本文拟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观照，探讨“后 2020”时期农村地区生产场域、生活场域的重塑对行动者网络位置的影响、权威关系的离散，分析贫困惯习这一导致返贫的核心症结，最后提出返贫治理对策。

二、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H 县位于四川省中部，下辖 14 个行政乡，共 19703 户家庭。全县曾有 64 个村被列为贫困村，有贫困户 2050 户，贫困人口 6815 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11%。2020 年 2 月 18 日，H 县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行列。2018 年，全县投入 1.35 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57 个，建成生态种养基地 78 个，并成功申报全省直供港澳蔬菜基地试点县。全县发展生态蔬菜 2.35 万亩、特色水果 0.8 万亩、早实核桃 4.6 万亩、道地药材 2.6 万亩，养殖色湾藏香猪 16 万头、凤尾鸡 20 万只、中蜂 2.35 万群。围绕沟域经济和六大产业重点产区，开展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初加工，着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2018 年通过产业和就业扶持贫困户 786 户 1720 人，全年预计实现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05 元，与 2017 年相比增幅 10.6%，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67.8%。2017 年 9 月和 2019 年 11 月，课题组先后两次赴 H 县进行实地调研。鉴于 H 县村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乡与乡之间间隔较远等实际情况，课题组成员采取个别访谈法，分别对 QLX 的 5 户具有代表性的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第一户和最后一户脱贫村民，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村民六大产业的发展情况，对待贫困的基本态度，脱贫后生产发展规划，脱贫对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基本达到信息饱和。

三、产业发展：消解农村地区传统场域

1. 产业化生产模式消解传统生产场域

场域即关系的结合体，“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关系形成的根据是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从而形成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在不同的关系中，行动者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力，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16]生产场域是不同生产要素通过特定生产方式结合而成的网络，依据生产要素对生产的不同贡献而赋予生产要素所有者不同的得益权。人类生产方式的演进在生产力上表现为生产工具越来越智能化，渗透性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人与人的利益分配结构开始以智力、信息等为导向，其实质是人类对渗透性生产要素依赖性的增强逐步替代物质生产要素单纯量的扩张。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增收主要依靠追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大再生产，体力充沛者、劳动经验丰富的长者凭借天然优势在生产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以此享受增收收益。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化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为特征，信息化、智能化生产要素以及现代化管理手段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构型为另一个力量空间。在大市场这个开放的游戏系统内，该场域亦成为大市场中的子场域之一，受到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支配，依据行动者所有的不同禀赋结构形塑为一个包含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的差异系统，并据此分离出两类不同资源禀赋的人——新型劳动者和传统劳动者，他们面临不同的返贫威胁。

在新场域内，“知识、技术、信息”为王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变更着传统生产场域的力量构型，并形成了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渗透性生产要素因凝结了更多的物化劳动在新场域内取得支配地位，并以此获得超额利润的收益权，从而创造了以知识、技术、管理劳动交换经济资源的场域逻辑。H县“以产业发展促增收，以就业促增收”的脱贫政策在实现“摘帽”的同时，推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遵循“沟域经济”发展理念，H县做大做强了“早实核桃、藏香猪、道地药材、凤尾鸡、生态蔬菜、中蜂”六大主导产业，为保证农户持续增收、稳定增收，在后脱贫时期还须进一步发展规模化养殖，延长产业链，开发有机食品，创造H县农副产品品牌。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新型劳动者形塑了更大的增值空间。新型劳动者在获得特定收益的同时，也在竞争机制的支配下与其他子场域中的行动者争夺力量空间，并面临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市场风险，成为新的返贫威胁。比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发展蜂蜜养殖业的农户并不少，由此可能带来较为严重的产品同质化风险。一旦市场饱和，商品滞销，农户资金链断裂，就又会陷入贫困窘境。

新生产场域对渗透性生产要素的依赖消解了原场域的权威，改变了另一类传统生产者的场域位置。他们只有传统耕作经验，缺乏与现代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市场理念等，既不能承担农业现代化生产中的管理职能，又难以凭借简单体力劳动获取较大收益，伴随其价值创造功能日渐式微，逐渐退却至新场域的边缘位置。由于无法供给新场域所需要的资源禀赋，在充分享受了精准扶贫时期发放凤尾鸡、蒜苗植株、藏香猪等产业帮扶政策红利后，该部分群体难以继续分享产业化生产带来的增收，陷入相对贫困窘境。因为不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又会面临返贫威胁。

2. 产业链分工模式消解传统生活场域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传统农耕模式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人们需要以抱团取暖的互帮互助模式完成生产任务，抵御自然灾害，求得生存。弱势个体的彼此依赖实质上是通过信任度极高的血缘亲情、地缘乡情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获得生存必须的物质资源、精神抚恤的内部交换方式，并在交换中实现了生产场域与生活场域的直接同一。血缘、亲缘这类先赋性强关系就是行动者在生产和生活场域的社会资本，它规定了个体在村落场域里的位置，并形塑了村民之间平等的自然关系，规范为原始的社会礼俗，约束生活场域的运行。生活场域的逻辑投射到个体层面，衍生出“一人有事，全村出动”的行为结构和权利义务关系。然而，在现代化生产模式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精细化的分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组织模式被分工下的协同生产替代，跨越了地域和时间的协同组织生产割裂了生产和生活场域。在生产场域内，自然人被生产组织替代，先赋性强关系被平等的市场契约关系取代，等价交换、市场竞争、创新求变等植根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离散了乡土的社会礼俗，规训了农村的社会理性，^[17]重塑了脱贫后时期农村地区生活场域。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功能内嵌于以分工为纽带的市场交换之中，抱团取暖的生活模式逐渐瓦解。先赋性强关系的式微消解了村民与生俱来的交换资本，部分游离于产业链外的村民在失去了依靠的同时，自己也正在经历去价值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在调研中，我们向H县QL村第一户脱贫摘帽的lkzx询问了养蜂经历，lkzx谈到：养蜂不死了，能养活了，又愁没人买。还好村上帮我们找门路。那些人（销售蜂蜜的人）以前都不认识，现在认识外面的人了。认识的人多了，门路广了，我还在想着以后怎么带着大家一起挣钱。lkzx的谈话显示出H县村民生活场域的重塑过程，因为产业发展衍生出的交换关系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正在逐渐替代血缘、亲缘关系构筑的帮扶结构。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aeg，虽然在乡干部帮扶下脱贫摘帽，但依然没有发展起来可以持续增收的产业，当问到“怎么不和他们一起养蜂”时，aeg表示：“不认识那些人，他们做的干不来，我过我自己的。”正是因为产业发展脱节，部分村民在生活场域中的位置正在走向边缘，生产场域和生活场域的双重弱势结构叠加了他们返贫的可能。

四、制度变迁：农村地区返贫场域制度形塑

1. 精准扶贫制度形塑了新制度场域

精准扶贫制度是一系列扶贫制度集合，包括《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意见》等，构筑了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制度“安全网”。一系列制度安排形塑了农村地区脱贫制度场域。作为该场域内的“粒子”，贫困户获取精准扶贫制度安排下的利益，确定了被

动获取利益的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与政府间被保护与保护的关系。藉由制度关照，贫困群体，尤其是老年人和因病致贫的弱势群体获得了脱贫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由此可见，在脱贫制度场域内，政策帮扶形塑了该场域内特定的利益形式并投射至特定贫困对象，造就其特有的利益幻象。贫困群体作为这种现实可行的利益的既得者，对该场域的价值目标有着心照不宣的认可，对于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特定利益是不言而喻的。^[18]因而他们是该场域最积极的维护者。

2. 帮扶制度变迁可能导致返贫

在“后 2020”时代，疾病和其他意外仍是导致返贫的重要诱因。既有脱贫政策能否进入常态化和制度化轨道，以此应对疾病、老龄化等自然威胁是能否有效防止返贫的又一关键。疾病和老龄化固化了该部分群体的权力关系和场域位置，在新的生产场域和生活场域中，该部分潜在返贫的弱势群体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亦难以及时根据场域变化积极对自身行为做出适应性调整，几乎不可能依靠资金或技术禀赋在生产场域和生活场域中适应新的咨询交换渠道和资源传递方式，从而获取有力脱贫资源，只能处于被动接济的位置节点。但在“后 2020 时代”，农村精准扶贫将告一段落，伴随驻村扶贫干部的退场，国家扶贫资金投入规模的减少，该部分弱势群体不仅可能陷入相对贫困，还极有可能再度返回绝对贫困状态。诚然，“后 2020”再举全国之力精准扶贫不可持续，但未来农村发展制度安排能否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帮扶政策能否重点扶持农村低收入群体是关系该部分群体能否返贫的关键。

五、贫困惯习：形塑民族农村地区返贫场域的核心症结

1. 场域形塑了贫困惯习

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初始经验必然是优先的，更为重要；因此构建惯习的性情倾向系统也就具有相对的封闭性。^[19]故任何惯习都是历史的再现，并具有明显的惯性，最后演变为贫困价值观。^[20]传统贫困包括知识的贫困、收入的贫困、能力的贫困，主体对贫困的认知即是对知识贫瘠、收入微薄、能力欠缺形成原因的认知及是否愿意和如何改变它们的主观态度。农村地区被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乡土文化等多种因素形塑为特殊场域。在该场域内的社会行动者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建构了对贫困的认知。H 县地处州腹地，解放前没有统一县政，多为邻县管辖，村民养成了团结、彪悍的民风，以弥补正式制度缺位，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历次抗击自然灾害的经历形成了场域内特有的符号资本，建构了 H 县人的自我印象和贫困认知：一方面 H 县村民非常推崇被赋予的“H 县民兵”称号，显示出不畏天灾，敢与天地斗的豪气；另一方面，“宿命论”充斥了他们的文化场域，“风调雨顺”、“无病无灾”就被认为是最大的财富，在大多数村民看来，贫穷的根源在于自然环境恶劣。对于贫困，他们表现出既无畏，又无奈，活着便是财富的矛盾心态。笔者在调研中对一户单身农户进行过深度访谈，他是全村最后脱贫的户主。从村长处了解到，通过帮扶政策，该农户现在已有了家具、饲养了凤尾鸡，解决了温饱问题。问到：“现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的农活是不是比以前多了？”“以后打算再养多少鸡啊？”对方回答：“有吃有喝，不饿肚皮了。鸡放山上了，自己找吃的，发洪水就莫法了。还和以前差不多过。”从访谈中可看出，该农户对“脱贫”的感知仅仅是“不饿肚皮”，对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安排，尽管村长发放了凤尾鸡，但没有思考过怎么养得好、怎么依靠养殖业致富等摆脱相对贫困的问题，依然停滞于“靠天吃饭”的传统价值观场域。外部生存环境的改变显然没有对他形成强烈刺激，更没有以此反观自身知识、能力等方面的贫瘠，表现出与外部环境极不适应的贫困惯习，约束行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2. 贫困惯习建构并固化了“合情合理”的实践

脱贫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进入 2020 后，防止农村地区返贫的关键是以乡村振兴带动整个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产业发展模式的升级、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乡容乡风的文明化等都在冲击原场域，分化出或者极力维持原场域，或者致力于推翻原场域的子场域。而维持原场域的势力源于贫困惯习的惯性使然。实践是惯习的产物，是惯习的惯性得以实现的行动方式。藉由“宿命论”，行动主体安于“得过且过，靠天吃饭”现状，并凸显出排外、封闭的行为倾向，固守形塑于特定场域的“实践窍门”。及至访谈，rem 是村里较晚脱贫的村民，在政府帮助下已开始养蜂，访谈中问到：“现在养蜂遇到了些什么困难？打

不打算学习学习养蜂技术？想没想过怎么开发一些有 H 特色的蜂蜜？”等问题，rem 对养蜂这个脱贫手段明显很漠然，无从回答。又追问：“你更愿意村长给你发粮食，还是教你养蜂？”rem 不假思索地说：“给我发粮食。不会（养蜂）。”对于种蒜苗，则表示“和种土豆一样，放土里自己长。”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障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21]障碍的形成过程就是对现时事物进行过时的实践预期，作为过去场域产物的惯习以实践的方式指涉现时的实践行为，最终实现去现时化。访谈对象的养蜂实践再现了过去传统农业劳作方式在“后 2020”时期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指涉，凭借种土豆的固有经验，他们在当下依然置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情境中，并设计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行动路线，无论是养蜂还是种蒜，都是无非只是土豆的替换物，用内化的思维和行为作为“实践窍门”，维持“靠天吃饭”的场域运行规则。在具有相同惯习行动者的合作下，他们“合情合理”的自发实践活动在场域和自身之间完成双向构建，一方面不断再生产出自我惯习结构，同时再生产出惯习结构得以运行的场域结构。藉由传统种植经验再生产出养蜂经验，并排斥产业化种植养殖模式，维持着传统的场域结构。结果就是与其他村民收入差距逐渐增大，依然保持“靠天吃饭”的生态脆弱性，外部帮扶举措酝酿了等、靠、要的思维定式，“合情合理”的实践使贫困工具化了。

六、脱贫后时期民族地区返贫治理对策

1. 以扶植产业发展为核心任务，推进“边缘户”生产场域的根本改变

“后 2020”时期，要以产业发展作为防止返贫，促进长效增收的根本举措。以乡村振兴带动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内在衔接，做到统一布局，精准发力。

（1）产业发展规划。在产业发展规划上，要从县域经济发展高度谋划布局，从整体上将各村各乡产业发展纳入县域经济发展规划，打破脱贫村与非脱贫村界限，注重各乡村发展的协调性，优化产业结构，避免低端产业重复发展，盲目竞争，奠定产业兴旺格局的基础。

（2）产业选择在产业选择上，要实现从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到市场引导配置资源的转变。既要立足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又要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市场潜力大，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功能化、多样化的产品，充分利用大数据向村民提供有效及时的市场信息，构建线上线下、村里村外、生产销售相融合的生产场域。

（3）产业设计在产业设计上，既要着眼于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形成产业集群的长远目标，又要与本地区产业发展实际状况和资源优势结合，从补短板 and 扬优势两方面发力。根据产业发展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针对上、中、下游的产业发展政策，积极开发新业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品牌，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开发新型业态，为“边缘户”塑造更多第三产业的的生产场域。如 H 村将在“后 2020”时期重点打造 H 县有机蜂蜜特色农副产品品牌，在做大做强基础上做精做细猪肉产品深加工，利用 H 县独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开发红色旅游等新业态，以此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4）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善农村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为农户搭建网络商务平台，利用现代商务平台了解大市场需求，助力 H 县农产品走出省际，迈向全国，打造集 H 县牲畜产品、旅游业、农产品、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综合农产品交易中心。在此过程中积极主动寻求与东部区域合作的机会，促使人、财、物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大市场范围内流动起来，为农户加深市场参与度，依靠劳动创造财富，借助交易增加收入，在大市场场域中获取更多的资源交换方式创造条件。^[22]

（5）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积极有序推动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根据 H 县实际情况，在产业发展支撑下，通过引进种植项目，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把部分农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大规模种植业发展，无劳动能力者凭借土地参与收益分配，解除其返贫隐患，有能力者在更大规模上逐步实现机械化生产，增加收益。为农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收入占比。从鼓励外出务工和挖掘内部就业岗位两方面入手。可依托 H 县特色产业，在把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成立生产合作社，为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稳定其收入来源。

2. 建立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机制，精准定位返贫防治对象

(1) 统一思想认识。在思想层面统一对“相对贫困”的认识，纠正仅以收入判断贫困程度的不科学理念，为“后 2020”脱贫工作扫清认识障碍。

(2) 建立村民生活动态监测系统。构建涵盖数据核准校验、数据稽核修改、数据筛查等项目的村民基础数据库；制定切实可行的村民生产生活情况动态监测方案，采取一月一报方式，根据产业发展和村民收入增长实际情况，确定村民收入较为科学合理的中位数标准；健全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村民收入统计机制，利用大数据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村居民收入动态监测体系，及时调整贫困认定标准，为有效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合理依据。

(3) 分类定级。贫困群体借鉴发达国家实践经验，从致贫原因入手，对相对贫困群体分类定级，建档立卡，因需施策。一类是从生理性致贫原因入手，密切关注农村的“五保人员”和城镇的三无人员、残疾人员、重病人员等。该部分人员丧失劳动力，不可能从事种养殖体力劳动，应以社会保障兜底政策为保证，防止其返贫；二类是“有体力，无能力”，贫困惰性较为严重的群体。该类群体较为隐蔽，可继续采用“手拉手帮扶制度”，从帮扶干部处了解其思想动向，以提高其经营性收入比例，降低其保障性收入比例为短期目标，以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提高可持续增收能力为长远目标，多管齐下激发其脱贫内生动力，阻断返贫主观可能。

(4) 构建进入—退出机制。重点抓住价格变动、产品积压等市场风险致贫新因素，构建相对贫困进入—退出机制，区别短期和长期相对贫困户，为从事产业生产、自主创业的村民分担市场风险，通过核查其收入来源是否稳定，实行家计调查式补贴，帮助其渡过短期难关，退出相对贫困群体。

(5) 建立完善的指标机制。建立完善的“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指标跟踪机制、预警机制及核查机制，做实做细指标动态跟踪，真实全面掌握指标异常，迅速及时查证问题原因，精准识别监测预警对象。

3. 继续强化“智志”双扶的造血功能，从知性层面铲除贫困惯习

(1) 建立利益联动机制。建立“边缘户”深度参与产业项目的利益联动机制，从根本上重塑贫困惯习滋生的生产场域，让他们切实参与到产业生产中，开发其体力和能力。

(2) 提供条件。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营造“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舆论氛围。积极发挥先富村民的带头作用，重塑 2020 年后乡村新风气，为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赋予新内涵，实现为改变其场域位置提供可能。

(3) 转变观念。重新建构“边缘户”自我印象，继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扩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帮助其实现从“脱贫攻坚对象”到“脱贫致富主体”的角色转变，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观念转变。

(4) 从质量上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方面加大教育投入。针对村民不同需要，结合乡村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的为村民子女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为“有体力，无能力”的成年村民提供职业教育。立足于产业发展需要，增加大数据应用，营销技巧等培训内容，灌输数字化劳动理念，着手发掘和培育一批学习能力强、思维活跃、积极上进的新型职业农民。

(5) 重点关注可能辍学对象。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实施清单制度和台账管理，对先前有辍学经历的个人予以特别关注，摸清其辍学原因，灵活采取随班就读、送教上门、一对一学习帮扶等特殊教育方式保障适龄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对厌学学生做好劝返复学工作，对留守儿童做好入学保障工作。

4. 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体系，重塑“边缘户”生活场域

相比用于消除绝对贫困的行政资源支撑，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对消除相对贫困的作用更大。囿于“边缘户”社会关系狭窄，难以适应“后 2020”时期现代化生产方式对现代信息关系网络的要求，需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服务体系。

(1) 引导和鼓励多元主体介入社会救助。在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前提下，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兵组织、青年组织、慈善组织等通过慈善信托、社会扶贫网、结对帮扶、捐赠款物、消费扶贫等方式加入农村地区社会救助，积极创新内生性救助方式，发挥生产组织、就业培训、理念宣扬等功能，关注能力与服务援助，如留守妇女就业培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数字劳动培训等，通过培训改变农户固有禀赋结构，以获得交换资源的新途径。

(2) 建立和完善事前救助体制。完成从事后救助向事前救助的转变，积极防范返贫风险，根据相对贫困发生机理，建立风险预警和干预机制，最大程度阻断返贫发生。

(3) 保障贫困人口合法权益。建立畅通、便捷、及时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借助信息公示制度、投票制度等提高“边缘户”在村落事务中的参与度。

5.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筑弱势群体的防止返贫制度场域

“后 2020”时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要将其纳入乡村振兴的大格局中，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还要从社会保障层面做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从而形成可持续性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1) 大力发展特色优质产业。着眼于奠定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缓解国家财政能力与社会保障投入之间的张力，把国家财政投入这种外生性社会保障模式与依靠农村集体投入这种内生性社会保障相结合。大力发展 H 县特色优质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将产业发展积累作为“后 2020”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助力源泉。

(2) 结合实际，明确分工，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后 2020”时期各个脱贫县发展实际水平差异，建立与地方实际发展水平相契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从整体上看，保障体系要涵盖基本生存型保障、补偿型风险保障、提高型福利保障、补充型商业保障四个层次。在“后 2020”时期，国家主要承担第一个层次的兜底性社会保障，可将部分扶贫资金作为兜底性社会保障基金，精准保障老弱病残群体的生存需求，有效解除返贫威胁。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承担第二和第三层次的风险保障和福利保障，主要针对产业发展中的自然灾害、市场风险。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因病、因灾等赔付的启动线，实行阶梯型保险赔偿，鼓励支持各乡村将壮大集体经济收益在经村民代表决议通过后，用于防贫救济救助。

参考文献：

[1]唐任伍，肖彦博，唐常．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

[2]阿马蒂亚·森著，任贇，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陈超群，罗芬．乡村旅游地脱贫居民返贫风险综合模糊评判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4]吕秀芬，麦强盛，李谦，刘燕．相对贫困治理研究的一个方向：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J]．科学与管理，2019，(06)．

-
- [5]庞淼. 西部生态脆弱社区气候变化适应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农村经济, 2019, (10).
- [6][13]兰定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防治探讨[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1).
- [7]李长亮.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返贫因素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19, (03).
- [8]陆汉文, 梁爱有. 第三方评估与贫困问题的民主治理[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5).
- [9]丁志刚, 李航. 精准扶贫中的“精神贫困”及其纾解——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的视角[J]. 新疆社会科学, 2019, (05).
- [10]王晓毅. 2020 精准扶贫的三大任务与三个转变[J]. 人民论坛, 2020, (01).
- [11]范和生. 返贫预警机制构建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 (01).
- [12]王海燕. 贫困退出机制中贫困户返贫风险评估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 (05).
- [14]袁方, 史清华. 创业能减少农村返贫吗?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J]. 农村经济, 2019, (10).
- [15]龚晓王君. 试析青年农民“因婚返贫”的非正式制度诱因及其整体协同治理策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03).
- [16][18][19]布尔迪厄, 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7][20]仇凤仙, 杨文健. 建构与消解: 农村老年贫困场域形塑机制分析——以皖北 D 村为例[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04).
- [21]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2]朱方明, 刘丸源.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02).